

润物细无声

——中国主题图书海外传播故事

□ 本报记者 张稚丹

图书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文化承载着国家的精神价值。近年来，走出国门的主题图书如春水奔流，将当代中国的制度理念、价值观念、学术理论、文学作品以及中华文化的精髓传递给海外民众。

《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出版12个语种13个版本；

由国际一流出版机构出版的《中国当代生态学研究》英文版、《中国法学史纲》荷兰文版，被收入世界知名文库。记录神舟飞天、高铁等中国原创技术研发历程的《中国创造》系列英文版销售1000套；

四大名著连环画法文版销售超3000套，《三体》三部曲30多个文版累计销量超330万册，《长安十二时辰》泰文版销售近万套；

曹文轩儿童文学作品翻译为35个语种海外出版，中国原创绘本《安的种子》中英双语版、《小兔的问题》英文版分获“美国弗里曼图书奖”“儿童文学银奖”和“国际杰童书奖”……

罗列下去，这会是一个长长的单子，我们撷取几本，细看海外传播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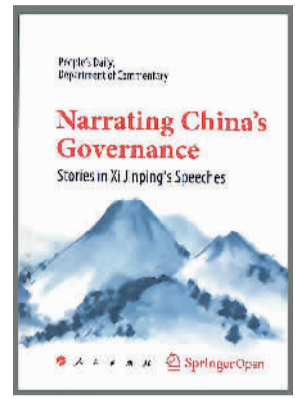
故事可以载“道”

习近平在《之江新语》书中讲过一个故事，偏僻小村庄的党支部书记郑九万生病，一天之内村民自发筹集数万元手术费。当地干部感慨：“假如我病倒了，有多少村民来救我？”这个故事深刻揭示了“老百姓在干部心中的分量有多重、干部在老百姓心中的分量有多重”的丰富内涵。

人民日报评论部编写的《习近平讲故事》（人民出版社）为这个故事丰富信息、还原语境——郑九万任浙江省永嘉县九峰村党支部书记十几年，倾其所有为村民付出。他生命垂危之际，人均年收入2000多元的乡亲们翻箱倒柜，拿出养鸡场买饲料的钱、女儿的零花钱、肝腹水患者的买药钱，体现了党和人民的鱼水情。故事可以载道，把深刻的思想、抽象的道理，转化成鲜活的故事，既接地气，更见视野、显水平。

《习近平讲故事》累计输出31个语种，英、俄、韩等16个语种已出版，纸书国际销售超3万册，日文版2018年发行后迅速挺进日本亚马逊畅销书排行榜，英语数字版开放式获取（OA）下载量达到1.2万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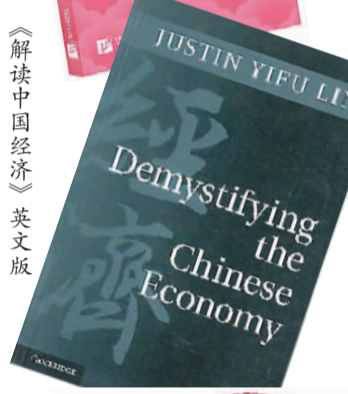
人民出版社对外合作部李冰告诉记者，鉴于不同国家民众对中国了解的程度、意愿、方向有所不同，他们同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公司合作，施行一国一策的差异化推广，如在土耳其、尼泊尔、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和伊朗5个国家举办阅读推广展示展销，土耳其文版进入17家书店和当地最大的线上图书销售平台，塞尔维亚主流媒体当纳斯（Danas）作了书评报道，合计发行超万册。差异化推广有赖于精准的市场调研。如能建立某种机制，联合各文化、出版机构在海外设立的公司、书店、分社等做好国别文化调研，分析影响力强、销售量大的中国输出图书的题材、体裁、作者特点及表述方式等，必将促进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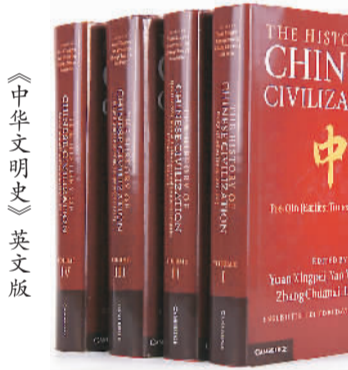
《习近平讲故事》英文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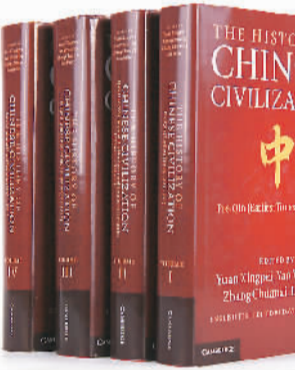
《70年的70个关键词》



《解读中国经济》英文版



《中华文明史》英文版



《中华文明史》英文版

很尴尬，因为我在西班牙都不会泡脚，但后来也习惯了。看完春晚出去放鞭炮。第二天早上，按照中国习俗，我穿上新衣服，吃了芝麻馅儿的汤圆。我觉得中国的春节很热闹、很温馨，我喜欢这样的感觉。”来自西班牙的Jorge Canalejas这样描述“春节”。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周鹤说，北语是对来华留学生进行汉语、中华文化教育的国际型大学，先后有184个国家和地区的学子来此学习，素有“小联合国”之称。2019年初，北语社就考虑发挥自身优势，出版一套口袋书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其中一本就是《70年的70个关键词》。

来自40多个国家的专家学者、职场人士和学生，受邀围绕改革开放、两会、高铁、移动支付、网购、外卖、微信、广场舞、中医、二十四节气等70个反映中国社会的关键词，用一两句话讲述亲身经历或切身感受。外国人表达，给外国人看，生动活泼的小切口勾勒出一个充满活力、传统又现代的中国。

英文版70 Keywords for 70 Years (1949-2019)率先在Phoenix Tree Publishing Inc. (美国梧桐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北语社随即推出中文版。至今，英文版销量已超过4000册，柬埔寨、沙特、意大利、埃及等国



安卡拉书店摆着《习近平讲故事》土耳其版

学校图书馆均有采购，美国西密歇根大学将它作为中国国情课辅助教材。

学术亦有魅力

《解读中国经济》首版为2008年出版的《中国经济专题》，根据林毅夫给北大本科生开设的大课“中国经济专题”记录整理。

有位网友“不g”的中国读者读后豁然开朗，体会到经济工作的环环相扣，牵一发而动全身；农民外出

务工开阔眼界，减少了务农人口，间接促进粮价上涨、农户收益增加；而要在务农人口减少前提下保证粮食不减产，又需要提高生产技术，“感觉到全国工作上一盘棋，每项工作都需要科学谋划布局”。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西方对持续良好发展的中国经济产生浓厚兴趣。2009年，《中国经济专题》德文版亮相法兰克福书展。

北京大学出版社谢娜告诉记者，当时剑桥、芝加哥、斯坦福几个大学出版社都对出版译本感兴趣，北大社最终选择了剑桥。林毅夫修订全文，将英文版定名为Demystifying the Chinese Economy，中文版也随之更名为《解读中国经济》。英文版被世界各大图书馆收藏，还在英国牛津、剑桥、斯坦福等大学书店销售，电子书纳入Cambridge Core（电子期刊和电子书数据库）销售全球，纸书、电子书累计销量超6500册。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杰·迈尔森教授认为：“这本书探讨了中国从一个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向一个现代经济增长的全球领导者进行巨大转变时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林毅夫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中国及世界现代经济发展前提的全新而重要的视角。”

英文版出版带动了多语种的版权输出，该书荣获2009、2011、2017年度“输出版优秀图书奖”。截至目前，各语种译本共计销售近2万册。

在美国亚马逊网站，68%的读者给予该书五星好评。有读者评价说：“我看过很多经济学书籍，但没有一本像本书这样解释了政府、国家的禀赋和经济理论之间的因果关系。”

北大社的《中华文明史》更是在2004年撰写过程中，主编、著名学者袁行霈就与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著名汉学家康达维交流探讨，如何写作更能西方读者所接受，并筹建翻译团队。

2012年，《中华文明史》英文版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成为“剑桥大学图书馆”首批入选图书，至今已销售2000余套。之后该书陆续输出了日文版、俄文版、韩文版、塞尔维亚文版、匈牙利文版、印地文版等语种，均进入当地主流社会和主流市场，反映了优秀选题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北大社的体会是：学术性、思想性强的学术图书一直是海外汉学界感兴趣的热点。学术著作要“走出去”，高水平内容是前提，高水平翻译是关键，政策支持是有力保障和助推器。

近读李文明新作《读懂中国粮食》（人民日报出版社），该书将中国粮食问题置于古今中外大视野中进行考量，从各个侧面扣住了粮食安全课题，这也是大国粮食的永恒课题。

粮食安全与能源安全、金融安全并称国家三大安全，且粮食安全更具有不可替代性。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形成了一整套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理念、战略、政策和做法：

一、始终坚持以为自主、立足国内的粮食安全方针。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国和消费国，尽管农业资源禀赋欠佳，但解决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不能寄望于国际市场。中国一旦从国际市场大量采购，势必引起国际粮价大幅上涨，影响我国与一些缺粮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立足国内有没有潜力？答案是肯定的。我国小麦、水稻、玉米的单产水平分别是单产前10位国家平均水平的60%、71%和67%，增产仍有潜力可挖。中共十八大后，中央进一步明确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优先序，要求做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

二、提高综合生产能力。一是藏粮于地，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同时加强早涝保收高标准农田建设。最近18年来中国粮食连年丰收，打破了以往“两增一减一平”的怪圈，主要得益于此。二是藏粮于技。相比1978年，2020年粮食播种面积减少5700万亩，产量却翻了一番多，主要靠良种良法促单产提高。三是优化区域布局。不同农产品往往在某些区域具有比较优势，优化布局，是降成本、提效率的重要途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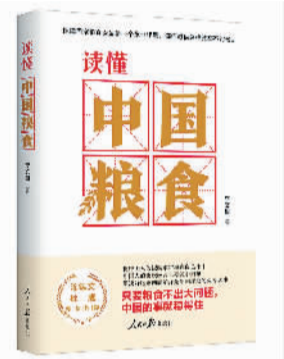
三、保护和调动种粮积极性。一是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确立家庭联产承包制，继续取消农业税后，国家逐步建立、完善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实施生产者补贴，建立最低收购价制度，加强服务体系。二是调动农业科技人员积极性。中共十八大以来，国家推进农业科研事业单位改革，实行人员聘用制；搭建科研成果交易平台；强化公益性职能的同时，放活经营性服务，允许科研人员和技术推广人员自主创业、持股兼职。三是调动地方政府抓粮的积极性。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即建立粮食省长负责制。为了解决“产粮大县、经济小县、财政穷县”问题，中央财政从2005年实施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探索建立对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

四、健全粮食储备制度，畅通粮食市场流通。中国粮食流通经历了从统购统销、调拨包干到多渠道流通，再到粮食购销市场化、从批发市场到线上交易，市场类型齐全、交易方式多样的市场体系和四通八达的粮食物流体系。

五、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为弥补国内资源短缺、缓解资源环境压力、调剂品

中国的粮食安全战略

□ 杜鹰



种和丰歉余缺，中国从国际市场适度进口农产品，也有利于集中力量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和口粮绝对安全。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第一次提出农业“走出去”后，特别是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海外农业合作、投资、并购日趋活跃，合作领域从种养业拓展到农业全产业链。

近年来，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国内玉米价格上扬，社会各界对粮食安全格外关注。总的判断可以讲两句话：一是总量基本平衡，二是结构性矛盾突出。作为口粮，小麦、稻谷供需平衡有余。

2013年，我受聘为国务院参事，就粮棉油糖等大宗农产品的生产、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改革等，多次带队到农业大省实地调研，在国务院参事室工作的李文明，几乎每次都参加了调研。当时只是而立之年的他知识储备较丰富，善于思考，有不错的写作能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次阅读，让我对他有了新的认识。他的新作较好地处理了专业与通俗的关系，不失为一部很有可读性的专著，对了解或研究中国粮食问题，确有益处。

（作者系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主任）

瞩目一方水土的芳华

□ 王国平

全球化时代，人类同住“地球村”，地域的概念显得有些模糊，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地域”的价值也更加突出。地域风格越清晰，辨识度越高。在这样的背景下，王永盛的长篇小说《时代荣光——闽南红色风华录》瞩目一方水土的芳华，表现出书写一方热土的历史温度和人文精神。

“闽南”是东西方文明交融交汇的前沿，一批批中国人下南洋、过台湾，都从这里启程。“红色”凸显了故事的时间和背景。两个词并置，就大境界定了叙事的基本脉络和主要走向。

《时代荣光》表现了以陈嘉庚为代表的闽南华侨献身祖国教育事业的精神。他们将教育视为一切的根本和万事的源头。“捐资一道，窃谓莫善于教育。”“国家之富强，全在乎国民。国民之发展，全在乎教育。”“斥资建校，其实也是一种投资。这个投资获利更大，只不过，这个‘利’，不是我们来取，而是许多国孩子弟来获取。”作者专门拿出笔墨，写陈嘉庚访问延安时，刚下车就听见了厦门大学、集美学校的铃声。原来这个革命大熔炉里有他的学生。

塑造人物，是作家的一个基本功，也是小说的一个支撑点。作者笔

下的陈嘉庚，有着谦虚的品格和宽广的胸襟。厦门大学礼堂建成时，有计划以他弟弟陈敬贤的名字命名。陈嘉庚得知：“以学校公器，不应自私，力持不可”。

在小说中，作者让我们结识了几位闽南籍女性。她们都是热血女子，向往自由，一身正气，对国家和民族怀着深沉而真挚的爱。在作文课上写下“卫国何须分男女，誓以我血荐炎黄”的李秀若，受集美学校校歌中“桃李尽成行”的启发，声称“我不仅要成行，还要成林”，随之更名为“李林”。她寻求救国救民之路，在战场上自饮最后一颗子弹，壮烈牺牲。还有十几岁写下“把名留在世上，才算空活一世”的陈淑媛，到上海更名为“白冰”，奔赴延安又改名为“莫邪”，立志像鲁迅的《铸剑》中那把名为“莫邪”的锋利宝剑一样，“经过磨砺，所向披靡”。从更名可以看出她们心态、思想的变化，看出她们的坚定与果敢，看出闽南女子博大而深远的精神境界。

这部作品的版权页上标注这是一部“长篇小说”，读来有着强烈的纪实性和史实性。“大事不虚，小事也不虚”，这可以视为一种风格追求。

作为依存于当代科技手段、综合了视听和想象等人类多维机能、有着大众性和广泛影响力的审美形式，电影和电视，实际上拓展了传统的视觉艺术、听觉艺术的美学范围。贺志朴、马明杰新作《影视美学通论》（中国纺织出版社）系统阐释影视美学理论，并有触及影视艺术对传统美学理论的贡献，加深了人们对当代影视文化现象的认知，令人耳目一新。

古希腊的柏拉图、近代哲学家黑格尔都曾对“艺术模仿自然”一说持不同看法。柏拉图指出，绘画艺术是“影子的影子”，远离了真理；黑格尔说，艺术的模仿只能把现实的外形提供给某一感官，它给人的不是真实生活，而是生活的冒充，艺术应该满足更高的心灵旨趣。作为艺术美学的共识，这种说法有着强大而持久的影响力。

到了20世纪，法国电影理论家巴赞提出，电影实现了“逼真、完整地再现世界的神话”，“逼真、完整地再现世界的神话”。电影作为综合艺术，把全维的现实提供给人视听、想象，表达了世界的纯真面貌。德国学者克拉考尔把电影叫作“素材美学”，认为电影表达了人和其所来自的客观世界的亲和性，从而具备文化救赎功能，开辟了模仿论美学的新视野。他们的理论超越了传统美学对模仿论的批评，《影视美学通论》站在巴赞和克拉考尔的角度，看到了传统艺术美学的局限

为经典美学注入新思考

□ 高贺胜

性，在对基础理论的阐释和反思中获得了乐趣。

影视艺术是否建构了新的“现实”？理论的魅力或者就在于否定之否定。前有巴赞和克拉考尔真诚地将电影对现实的全面反映，礼赞电影带来的人和现实的亲和性，后有电影第二符号学理论否认影视艺术对现实的客观反映，如法国学者博德里把影视看作是通过一系列“电影机器”对现实所进行的有目的的建构，人和影像文本之间存在着一一种想象性的关系，影视作品是人为制造出来的白日梦，导演、演员和观众从这个梦中体验到的是自身的意念、情感和欲望。法国学者麦茨认为，电影不是“对现实为人们提供的感知整体的摹写”，而是具有约定性的符号。影视文本对现实的建构离不开电影机器、观影欲望等一系列环境或工具因素的合谋，它们在主体和影像间构造了一种“意向性”的关系，使影视作品成为观众心理结构的倒影式摹本。这就涉及了一个具有普遍性的

艺术美学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同样可以从建构现实的角度看待建筑、绘画、音乐、戏剧等其他艺术形式，分析它们在主体和对象之间建立的各有特色的意向性关系，把握它们对现实所做的“现象学还原”，借以重新审视人与它们间的关系。在这一意义上，不同形式的艺术作品同样是建构者精神的“倒影式摹本”，只不过在多数情况下，它们不局限于潜意识欲望的层面，而是包含了更广泛意义上的个人际遇和社会文化理念。

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艺术的独特性和价值。

艺术的价值在于它表达了新的情感经验。自古希腊至文艺复兴时期，这种情感经验通过艺术家个体的天才创造来实现。因为城邦或贵族的资助，艺术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外在物质和名利的依存，在愉快的游戏中从事艺术创造，体现了黑格尔所谓的艺术理想。但市民社会兴起后，艺术和艺术家受制于资本和利润，创造方式发生了巨大



变化，影视艺术作为一种“文化工业”进行生产和制作。在这种情况下，影视流水线生产和人类情感经验的独特性如何实现平衡？或者乐观地说，影视艺术在挑战传统美学的时候，为其提供了什么新向度、使之获得了什么新形式，也是饶有趣味的理论问题。

影视美学不是全新的话题，但该书在叙述中时时融入关于美学原理、文化理论方面的思考，体现影视艺术和美学理论的对话，既展示了开阔的理论视野，又紧密关切影视实践与文化发展的现实，对门类艺术美学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同时纠正了影视艺术的美、领悟它的意义，回应当代影视文化的新现象，保证影视艺术的健康发展，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作者系河北传媒学院影视艺术学院常务副院长）